

MEDIA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中美传媒互动
与文化交流

肖欢容 孙璐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美人文交流系列丛书

MEDIA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中美传媒互动
与文化交流

肖欢容 孙璐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美传媒互动与文化交流 / 肖欢容, 孙璐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

(中美人文交流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5201 - 1728 - 9

I. ①中… II. ①肖… ②孙… III. ①传播媒介 - 文
化交流 - 研究 - 中国、美国 IV. ①G219.2 ②G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3348 号

· 中美人文交流系列丛书 ·

中美传媒互动与文化交流

主 编 / 肖欢容 孙 璐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李延玲 任文武

责任编辑 / 高振华 吕秋莎 郭瑞萍 贾宏宾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区域与发展出版中心(010) 59367143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17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728 - 9

定 价 / 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信息是文化、观念、舆论、政策的基础,传媒是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中美传媒之间的交流反映了两个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的国家间相互影响的过程,是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两个不同民族间思想和意志的跨文化交流,更是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重要工具。此外,传媒在中美两国关系中也承担着传媒外交的功能,即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等渠道向他国公众传递信息,进而影响目标国公众舆论并且塑造本国国家形象,这一过程也是构建和加强自身软权力的过程。信息传播渠道是国家构建软权力的要素之一。一个国家若想获得软权力,除了在国内国际积极作为提高自身信誉度,还应该拥有高效的传播渠道,唯此才能拥有更强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因此,在中美关系中,传媒在塑造各自国家形象、影响中美两国关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书名为《中美传媒互动与文化交流》,共分为四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期内中美传媒交流情况做了梳理与分析。第一章“新中国成立前美国驻华媒体”对中美两国在彼此了解和认识都相对匮乏的背景下,由美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中国丛报》和美国侨民在华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进行了细致的内容分析与提炼,彰显了新中国成立前中美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美国驻华传媒不容忽视的作用。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驻华官方媒体”描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间的新闻交流事业历经波折并最终开启的过程,将美联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及对中国事务的报道作为研究重点,着重指出美媒驻华记者在中美文化交流中起到的桥梁作用。第三章“美国华文媒体”简要回顾了随着华人移民的增加,华文媒体在美国 150 多年的发展历史,并以《星岛日报》《世界日报》《侨报》这三大兼跨美国东西海岸发行的华文报纸为例,分析了华文媒体的兴衰及与中美两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外交关系,尤其与双边的移民、教育政策,以及政府对民间交流的态度;着重介绍在美华文媒

体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第四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驻美官方媒体”选择中国官方媒体中最有代表性的通讯社、电视媒体和纸质媒体（即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社）作为中国驻美官方媒体的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驻美官方媒体“走出去”战略及其面临的挑战，高度评价了中国驻美官方媒体为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所做出的贡献。

本书的作者（撰写章节）分别是：孙璐（第一章），张玘玘、王丹丹（第二章），张欣欣（第三章），孙璐、张娟（第四章）。其中张欣欣和张娟分别来自美国的学术界和传媒界，掌握着第一手的前沿研究资料。相信本书能从不同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中美传媒在不同时期的关系维度。

本书是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2012 年度招标课题“中美传媒交流互动研究”的最终成果，感谢基地执行主任贾庆国教授、执行副主任王栋副教授以及余万里先生等对课题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此外，责任编辑的努力，也使本书增色不少，特此表示感谢。

本书的作者，大多是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领域的研究者，所以在一些传媒领域的细节和表述上，纰漏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肖欢容

2015 年 11 月 20 日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美国驻华媒体	001
第一节 早期中美关系与美在华“印刷”媒体的出现	001
第二节 美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中国丛报》	007
第三节 美国侨民在华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	037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前美国在华传媒与中美文化交流	050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驻华官方媒体	060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媒体驻华概述	060
第二节 美国驻中国四大官媒的发展历程	061
第三节 美国官媒对中国大事件的报道	082
第四节 美国驻中国官媒对中美文化交流的影响	091
第三章 美国华文媒体	098
第一节 中美关系与华文媒体在美的发展历史	098
第二节 《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侨报》	122
第三节 美国其他华文媒体	137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驻美官方媒体	150
第一节 中国驻美三大官媒的发展历程	150
第二节 中国官媒与中美间重大事件	159
第三节 中国驻美官方媒体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路径	185
第四节 中国驻美官方传媒与中美文化的交流	193
参考文献	197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前美国驻华媒体

第一节 早期中美关系与美在华“印刷”媒体的出现

一 中美两国的早期接触及对彼此的初步印象

美国建国较晚，美国人何时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中国这一国家并没有确切史料记载，不过可以肯定，在抗英独立前，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几乎与中国没有直接交往，对中国并无了解，因此，费正清曾说：“早期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几乎是从零开始的。”^①

1776年美国独立后，为发展经济和对抗英国，非常希望能够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当时中国的茶叶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从广州运至伦敦再转运美洲；美国的人参等土特产也是通过这种途径输入中国的。因为与东印度公司独立进行贸易，“美国人将亚洲看作一个整体，称它为东印度”^②。因此，在美国建国初期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美国人关于中国的信息多是从一些旅行者及东印度公司的商人那里零星得到的，而且对中国存在着相当深的偏见，他们认为中国人是“长尾巴的天朝人”“未开化的‘猪眼’人民”，即便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也弄不清中国人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在得知中国人不是白种人时感到非常惊讶，尽管他已经知道他们的“外貌滑稽可笑”。^③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最初，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大多是通过外在的长相和肤色来获取，这种

① [美] 费正清：《19世纪中叶的美国与中国》，选自欧内斯特·梅编《美中关系史论——兼论美国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关系》，齐文颖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22页。

② [美] 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虞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2页。

③ [美] 费正清：《19世纪中叶的美国与中国》，选自欧内斯特·梅编《美中关系史论——兼论美国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22页。

流传的被扭曲了的中国人外表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美国人来华的步伐。

中美两国的交流，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末的贸易往来。而在中美贸易正式往来之前，极个别的商人、游客、海盗曾来华探险。据可靠史料记载，至少黎亚德（John Ledyard）和戈尔（John Gore）到过中国。黎亚德是美国康州人，大学毕业后随英国人到世界各地探险，漫游过广州。返美后，讲述在华的所见所闻，引发了许多美国人的好奇心。特别是那些商人巨子，试图来中国发横财。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满载货物自纽约起航赴华，8月28日到达中国，成功地进行了贸易，次年5月12日返回美国纽约。“这次航行约为30727美元，约为投资额的百分之二十五。”^①此次航行，大出美国人所料，竟获纯利近4万美元，利润高达25%。美国新闻界争相报道，远航的报告也转到了美国国会。这次成功的中美贸易的开端，刺激了中美贸易的快速发展。“美国既没有像英国那样的东印度垄断公司，也没有参与当时欧洲战争，所以美国贸易发展迅速，1805年到1806年美国约有四十二艘货船。”^②“美国贸易的飞跃进展，很快在广州商业界中占到了第二位。”^③美国人对中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的美国议员还专门给华盛顿总统写信，建议重视和拓展对华贸易。美国国会于1789年至1791年曾立法保护对华经济贸易。

尽管美国人对中国仍非常陌生，但随着中美贸易的进行，还是摒弃了对中国人“丑陋”面貌的最初认识，将中国看成一个文明礼仪之邦，表现出尊敬和羡慕。这一印象最初来自输入美国的中国产品。当时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在北美殖民地享有很高的声誉，它们把中国的美好形象传达给美国人，成为美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那时，中国的瓷器、丝绸、漆器、画纸、象牙扇等，在美国既是商品，也是上等的艺术品，早期的美国人以家里拥有一两件中国货而自豪，尤其是在一些显赫之家，都要摆出几件精美的中国瓷器和展示丝绸借以炫耀。显然，当时的美国人认为遥远的中国生活充满了艺术。在鸦片战争前，美国一份著名的杂志还曾有文章赞美了中国人，“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在一切有关生活便利方面是显著

① [美] 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陈郁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10~11页。

② [美] 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陈郁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44页。

③ [美]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65页。

的，欧洲比较近代的几种艺术的源流，却已消失在蒙昧的时代之中”。^①当时，美国还出现了一些仿中国建筑，曾觐见过乾隆帝的荷兰人布拉姆定居美国费城，仿照中国建筑风格，建造了一幢房子，取名“中国隐退园”，吸引了众多客人参观；三十多年后，对华贸易商人邓恩在这座“中国隐退园”附近建造了一幢被称为“中国小别墅”的建筑，也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早期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另一个渠道是欧洲旅行家、思想家和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的古老、文明、智慧、富庶的中国仅仅给美国人一个直观印象。伏尔泰（Voltaire）、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和魁奈（Francois Quesnay）这些美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则从理论上树立了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那些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的开国者们，都对华充满了赞誉之情，认为中国是人杰地灵的礼仪之邦。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和詹姆斯·麦迪逊等开国元勋们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人的影响，把中国看作值得尊敬和效仿的大国。富兰克林对华钦羡备至，希望美国能在较短时间内拥有同中国一样的资源和财富。

1784年“中国皇后号”来华后，美国人开始有机会目睹中国的“庐山真面目”，第一批美国商人也在华见到了中国人的一些负面行为，比如，中国官吏的暴戾、腐败，一些贸易官员的欺诈行为等，在早期中美贸易中，美国商人最反感的是清政府官员从来不以平等的身份与他们打交道，视之为未开化的“蛮夷”。此外，他们对中国的宗教、风俗也殊无好感，批评中国崇拜偶像、迷信、笃信吉日以及一夫多妻等习俗。总之，在中美交往的早期，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好奇心和视中国为一个古怪地方的观念”的混合物。^②“一股软弱无力的充满优越感甚至反感的逆流和一种比较宽容的有时充满好奇心的对华观点同时存在。”^③到19世纪上半期，美国商人把中国看作商品的销售市场；美国的新教徒把中国当作他们全球传教的主要关注地之一。

相对于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美国的直接了解极其贫乏，中国虽然也早有人漂洋过海或接触过来华的美国商

① [美] 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陈郁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119～120页。

② 韩德（Michael Hunt）：《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和中国》，项立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第35页。

③ 韩德（Michael Hunt）：《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和中国》，项立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第57页。

人，但很少有人关注美国这个国家。

其实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有中美关系方面的文献记载，1602年，利马窦就在向明廷进献的《万国图志》中介绍了亚墨利加洲（美洲）。此后，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汤若望等也先后在他们的作品里介绍过美洲的情况。这些书籍，对中国人扩大视野，了解包括美洲在内的世界，从理论上来说原本是有价值的；但“天朝上国”的狭隘认识让清朝统治者漠视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土地，一些涉及介绍美国这类国家的书籍，往往被封建统治者们斥之为“多诞之莫信”！

二 美国（西方）对建立现存中国知识新体系的渴望

中美双边贸易虽然打通，但仅仅存在的商业关系并没有促使彼此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美国对中国文化认知依然很少。1818年，杰斐逊总统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并表示特别想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字。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如愿。1825年，13岁的美国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来到中国。他先到马六甲的英华书院攻读中文，后从事商业活动，能讲汉语和用中文写作。这是真正懂汉语的第一位美国人。可惜没有留下什么著作。1834年，一位美国商人出于好奇，从广东“买”了一位小脚妇女运至美国，美国人争看“三寸金莲”。这虽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却反映出美国人对中国文化习俗的无知。直到1838年，美国的哲学协会会长杜彭书（Peter S. Du Ponceau）经过努力，才出版了《中国文字之性质及其特征》一书。但他根本不能阅读中文图书，资料皆来源于欧洲人关于中国的报告和谈话，水平可想而知。^① 19世纪上半叶，随着中西交往的日益扩大，西方社会对有关中国各个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的渴求也愈加强烈起来。在既往300年里，西方国家在以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作品为中心，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关于中国的知识系统。然而，这一知识系统遭到愈来愈多的质疑乃至否定，重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重新建构关于中国知识体系的需求日益强烈起来。尽管当时的中美两国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商贸关系，但作为两国经贸往来的商人，基本不懂也不想学习对方的语言及文化，在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方面并没有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就在早期美国人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了兴趣，开始想要了解中国文化并且构建有关中国新的

^① 《早期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今晚报》2012年5月19日。

知识体系的这一时期，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美国（西方）传教士大批来华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就像鸦片贸易一样，是被清政府严厉禁止的。早期来华传教士多在南洋和澳门的华人中布道，南洋地区的马六甲、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新加坡、曼谷成为对华传教的前哨基地。他们努力学习汉语、翻译《圣经》，为日后布道工作的全面展开做准备。^①

19 世纪初，为适应美国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需要，美国仿效在中国早已立足的英国，设立了基督教差会。最早成立的有 1810 年设立的美部会（后称公理会），1814 年设立的浸礼会差会和 1820 年设立的圣公会、美以美会差会等。在美国传教士来华前，1820 年，美部会已正式聘请 1807 年即已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J. R. Morrison）任差会通信员，几经筹备，又选中了裨治文（E. C. Bridgman）为差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他成了早期中美文化交流的开拓者。与裨治文一道来华的是雅裨理，他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随后美国又派出大量的来华传教士。1830~1844 年在欧美国家派出的 57 名传教士中，由美国所属教会组织美部会、浸礼会、圣公会等教会组织派出的美国传教士就有 42 人，占了近 3/4。^② 在此过程中，活跃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的西方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当中，不少人受过良好的知识训练，其事业发展的需要使他们成为新一代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传教士持一种非常积极的姿态来与中国文化接触。当传教士来到中国，发现这个“异教徒”国家与他们的文化相差甚远，仅仅用传统的传教方式难以行得通，不学习中国语言及文化难以进行传教。因此，来华传教士想要实现其传教的目标，必须了解并学习中国文化。传教士了解中国后，一方面，有利于他们在华传教；另一方面，传教士向美国国内介绍中国，可以促使其向来华传教士提供更多的支持。因此，早在 19 世纪 20 年代，来华

① 当时在南洋地区活动的美国传教士有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雅裨理、特雷西、约翰逊、芒森、邻为仁、洛克伍德、迪金森、霍普、罗晋、内维尤斯、鲍尔、伍德、洛克武、波罗满、弼牧师，圣公会传教士汉森、文惠廉，长老会的奥尔、米切尔，大美浸礼会真神堂的里德、高德等。在澳门活动的美国传教士有公理会卫三畏、戴弗，南浸信传道会的叔未士、罗孝全和应马礼逊教育会之聘来华的美国人布朗。参见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第 159 页。

② 《中早期（1829—1844）欧美国家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名录》，载仇华飞《早期中美关系研究（1784—1884）》，人民出版社，2005，第 430~435 页。

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就开始向美国的《教会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投稿介绍中国的情况。而后，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汉学名著《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则进一步向美国人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促进了早期的中美文化交流。

四 美国（西方）传教士的布道遭遇阻力从而催生印刷媒体

在那一时期，传教士在华的传教工作是很难进行的，难以开展传教工作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的禁教政策。礼仪之争后，对耶稣会士颇有好感的康熙帝在其统治末年，态度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对传教士渐渐疏远；雍、乾二帝在位期间，对天主教仇视有加，不断发布禁教令，在乾隆时期，还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迫害天主教运动，致使天主教在中国大陆几乎绝迹；嘉庆帝即位后，对天主教同样采取禁止措施，多次颁布禁教诏令，因此，传教工作上的努力收效甚微。

外国传教士不被允许进入中国大陆，而且中国人对外国传教士怀有敌意，很难进行直接宣传。传统的宣教策略不能施行，尽管这些传教士们在传教的道路上面临着重重阻力，但仍孜孜不倦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寻求能够传教的方式和方法，一开始他们不得不求助东印度公司，但他们逐渐发现，避免传播信息的障碍必须另辟蹊径，探求其他传教方法，有一种办法就是通过印刷媒体进行。较早的传教士们已经用到这些廉价并且数量巨大的西方传播物，他们非常钟情于这些传播物的宣传价值。并且相当一部分人是精通文字工作的，传教士在中国的早些年的任务主要是语言学习、语言翻译、打印，在中国人中分发宗教短文。^①因此，他们的精力不仅仅放在布道上，他们也兼写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比如马礼逊来自教会，明白近代西方的书籍、报刊等印刷品在宣传上的功用，因而他自然地想到了使用印刷品来促进传教。他认为中国地方大、方言多，文字却是统一的，使用印刷品进行传教更易于为中国各地民众接受。于是，马礼逊开始尝试并使用印刷品来协助传教工作。他遵照伦敦会的指示进行翻译《圣经》和编纂《华英字典》的工作。在学习、工作之余，他还编写了《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注耶稣教法》等。

^① Elizabeth L. Malcolm, "The Chinese Repository and Western Literature on China 1800 - 1850",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7, No. 2, 1973, p. 165.

在广州活动的有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伯驾 (Peter Parker)、史蒂芬、罗孝全, 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 (Karl Gutzlaff) 等。这些传教士除公开或秘密传教外, 还从事一些文化教育和出版活动。他们开办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 招收华人入学; 设立印刷所, 出版书籍; 发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中国丛报》等。这些活动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其中益智书会的出版活动对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影响最大。^① 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还经常向国内教会组织提供他们在广州、澳门等地发行的书刊, 其中有《中国地志》《中文简续》《广东方言撮要》《中国商业指南》等, 内容以介绍中国文字为主, 反映中国政治、商业、文化和基本概貌, 还记载有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首次来广州的情况, 雅裨理的东南亚之行, 史蒂文森的中国沿海考察, 卫三畏的日本旅行以及伯驾在广州眼科医局活动的详细记录等。

第二节 美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中国丛报》

早期美国在华传教士所办的出版物中, 最具有影响力且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作为《中国丛报》的主编, 裨治文在创刊号上发表署名文章, 说明《中国丛报》出版的宗旨, 即“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向海外报道中国各方面情况和发生的变化, 以及这种变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可见, 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是创办者的主要目的。裨治文把《中国丛报》作为研究中国的重要工具, 发表了大量研究中国的文章, 被美国学界称为“来华传教之父”“研究中国学的开山鼻祖”。^② 《中国丛报》为美国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为中美早期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 《中国丛报》的创刊始末及背景

(一) 《中国丛报》的创刊始末

1807年, 来华第一位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乘坐美国商船“三叉戟号”

①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第159页。

② Susan Reed Stifler, "An Early American Sinologue: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The American Graduate's Quarterly*, Feb. and May, 1935, pp. 1-11.

(Trident) 来到中国。22年后,应美国商人奥利芬(D. W. C. Olyphant)和马礼逊请求,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以下简称美部会),向中国派出了第一批传教士裨治文和雅理理(David Abeel),他们乘坐奥利芬的商船“罗马号”来到中国。裨治文来到中国后发现,“基督教国家和这个东亚国家商业来往已久,但知识与道德层面的交流微乎其微”,^①他想在澳门或广州设立一家印刷所,创办一份搜集有关中国各种信息的刊物,在西方传教事业支持者中发行,以便获得更多的支持。这种想法得到了马礼逊的支持,马礼逊曾在1817年与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创办了《印中搜闻》^②(*The Indo-China Gleaner*),这份刊物坚持了五年,后因米怜的去世而停办,后来马礼逊曾试图再办一份关于中国的刊物《印中丛报》(*The Indo-Chinese Repository*),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成功。从中可以看出,马礼逊与裨治文都有创办刊物的想法而且并没有因中国的禁教政策而放弃信念,他们极力为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而四处奔走。

这种想法最终得到热心传教事业的美国商人奥利芬的支持,经过奥利芬的安排,由他所属的纽约布里克街长老会捐赠了一台印刷机,1831年12月运抵广州,但是铅字模板直到1832年4月才运到。^③一个月以后,《中国丛报》第一期在美国商馆的一个小房间里诞生了。而促使《中国丛报》立即发行的直接原因是裨治文他们获得了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的一篇日记,这篇日记是郭实腊不顾清政府的禁令,乘船在中国沿海航行的所见所闻。因为当时,外国在华活动区域主要限定在广州,裨治文认为郭实腊这些记录了中国其他地方情况的日记很有价值,想尽快为这些难得的信息提供发表的场所,所以,《中国丛报》在铅字模板运抵后的一个月就迅速发行了。1832年5月,《中国丛报》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并担任主编,美国商人奥立芬出资经营,裨治文请求美部会派遣一名“忠诚、虔诚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刷工”来帮助其办报纸,此事正好委托给卫三畏的父亲办理,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No. 1, p. 1.

② 这份刊物虽然由马礼逊和米怜共同创办,但是由米怜负责具体的编辑和发行工作,这份刊物虽然发行量不大,但在欧洲和美洲都有一定的读者,对不少想了解中国情况的人有一定的影响。

③ 雷孜智:《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尹文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74页。

他就推荐自己的儿子去中国负责此事。

此刊原无中文译名，旧译“澳门月报”或“中国文库”，也有学者将其译为“中华见闻录”或“中华丛刊”。在近20年的出版历程中，其主编曾三易其人：1847年前，主编为裨治文，参加编撰工作的有卫三畏、巴驾等人；1847年后，莱奇文、卫三畏先后就任主编，马礼逊、郭士立、麦都思、奥立芬、马儒翰等在华外国人为其撰稿。《中国丛报》出版地辗转于广州、澳门和香港，坚持办刊20年，刊出20卷，最后一卷附有总索引，初印400册，后增至1000册。它以在华外国人为主要阅读对象，也向美国、英国的一些城市发行。

《中国丛报》1851年12月在广州停刊，其停刊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于西方人对中国了解日益加深，当时报业竞争环境趋于恶劣，以及裨治文、卫三畏等负责人编撰精力不足等。^①

（二）《中国丛报》的创刊时代背景

裨治文所撰写的创刊词可以清晰地表明，就像上一章所分析的那样，即西方几百年确立的有关中国的认知和知识体系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时西方人对中国了解的需要，重新客观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就成为《中国丛报》创刊的重要时代背景。

创刊词：本报的目标之一为评论外文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关注的重点是已经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产生的原因和方式。许多古老的书籍虽然含有很多有用的叙述，但同时也充斥着毫无价值的论述。在过去外国人所撰写的书籍中，在一页之内就可以发现大量的不一致或相互矛盾的记载，当代作家往往对此感到迷惑，如关于中国的人口，这些书中提供的数字从2000万到33300万数字不等。因此，面对这些互相矛盾冲突的各种外文出版物，人们更需要寻求一种可靠、确定的资料，这需要我们尽可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中国权威著作。这些资料目前已经大量地出现并且涉及各种领域，无论是地理、道德、政治、商贸、文学还是宗教。此外，还有其他关于历史和统计数据之类的话题都会给我们展示中国的过去和现状。经过深思熟虑，我们不会以中国官方为主，只允许适量的来自中国方面的影响，从而极力避免走向极端……在目前，这些可以总结出许多主

^① 参见陆亨《〈中国丛报〉的停刊原因初探》，《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6期，第76~79页。

题，而每一个主题，无论是精神、道德、文学或者是宗教，历史知识和有关这个国家的数据资料是最需要的，既展现这个国家的过去也展现这个国家现在。^①

二 《中国丛报》的负责人和撰稿人

《中国丛报》索引的作者列表中，共有 100 多位撰稿人，绝大多数的撰稿人只是贡献了一两篇文章，而裨治文则提供了超过 400 篇稿件，还有其他一些作者也提供了较多的稿件。只有占很小一部分比例的稿件是匿名撰稿，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出其作者。为了研究方便，本章将《中国丛报》撰稿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零散撰稿者；第二类是主要撰稿者，代表人物五个，他们是裨治文、卫三畏、马礼逊、马儒翰（Robert Morrison）和郭实腊。

（一）《中国丛报》的零散撰稿者

第一类零散撰稿者的身份大都是传教士或者商人，其他还包括英美官员、翻译、医生、印刷商、船长、传教士的妻子以及中国宗教皈依者。学者白瑞华（Roswell S. Britton）在分析《中国丛报》撰稿者人员组成时指出：“《丛报》的撰稿人人员组成其实就是在中国的‘英美精英人群和研究人员’……”^② 我们可以列举一下其中的一些作者及其身份：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而后成为英国驻华大使，1888 年成为剑桥大学的第一位中国学教授；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一位中国文学专家，而后成为广东省的贸易主管，1844—1848 年成为驻香港的第二任总督；^③ 宝灵（John Bowring），杰里米·边沁和拜伦的亲密朋友，较为激进的《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合编者，1854—1859 任香港的第四任总督；^④ 顾盛（Caleb Cushing），一位非常杰出的律师和外交家，曾经在 1844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 No. 1, pp. 3-6.

② 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pp. 28-29.

③ See G. B. Endacott, *A Biographical Sketch - Book of Early Hong Kong*, Singapore: Donald Moore, 1962, p. 239.

④ George L. Nesbitt, *Benthamite Reviewing, The First Twelve Years of the Westminster Review 1824-183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4, pp. 29-32.

年参与《中美望厦条约》谈判^①；伯驾，中国第一家西方医院的创立者。^②

《中国丛报》绝大多数的撰稿人为传教士，而这些传教士绝大多数是美国人。传教士们都是非常热衷传教以及道德说教的，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优越性确信无疑，文明、谦逊这些特质是很难被其用于改变其他人的信仰。存在于传教士头脑中的因有偏见和西方的思维定式，使得很多传教士认为中国人除非吃饭时能够习惯用刀叉，否则是很难进行改变的。因此，“将科学的光芒和纯正的基督教倾泻到地球上的所有黑暗的地方”就是《中国丛报》所赋予传教士们的使命。^③在传教士的心目中，在基督教进入中国前，中国人是一个有较高文化水准和较长伦理和宗教传统的这样一个种族人群，但遗憾的是，中国自身的伦理和宗教并没有拯救中国人，中国人就像生活在黑暗的地狱中一样。甚至有很多传教士故意散播和编造中国道德沦丧和黑暗面的“故事”。事实上，这也和发源于19世纪20年代在美国流行的强烈的反宗教传统的思潮有一定的关联，^④在中国的传教士们发现只有去勾勒和描绘中国面临的可怕现实状况，才能去说服自己的国民目前中国是多么需要基督教的拯救。马儒翰观点甚至有些极端，他声称在中国的孔孟之道和那些所谓“神圣”的作品，如果将其与他们的《圣经》相比，都是“毫无意义”的。鉴于传教士一直持有如此固执的观点，因此那时中美两国是没有什么信仰交流的。

《中国丛报》的第二大撰稿群体是商人，尽管这些商人们参与了《中国丛报》的撰稿工作，但他们并没有对中国产生太大的文化影响，这倒不是他们的错误，就像一些商人如罗伯特·英格利斯（Robert Inglis）、罗伯特·桑姆（Robert Thom）^⑤和查尔斯·金（Charles W. King）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为“文化人”，但在那个年代，商人是中国社会阶层中的最低层级之一，因此即便西方商人很希望能够将其观点传递给中国人，但是机会较

① Dumas Malone (ed.),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Vol. 4,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0, pp. 623-630.

② Dumas Malone (ed.),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Vol. 4,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0, pp. 234-235.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 3, No. 7, 1834, pp. 294-295.

④ See Clifton E. Olmstead, *History of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60, pp. 271-273.

⑤ "Thom Had an Extremely Interesting Life", See Obituary,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6, No. 5, 1847, p. 242.